



史通评注

[唐] 刘知几◎著
刘占召◎评注



史通评注

[唐] 刘知几◎著
刘占召◎评注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通评注 / (唐) 刘知几著; 刘占召注.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5117 - 0308 - 8

I. ①史…

II. ①刘…②刘…

III. ①史学理论 - 中国 - 唐代②史通 - 注释

IV. ①K092.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9773 号

史通评注

出版人 和 龔

策划编辑 蒙 木

责任编辑 高立志

编辑信箱 momofofo@sina.com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总编室) (010) 66509246(编辑室)

(010) 66161011(团购部) (010) 66130345(网络销售)

(010) 66509364(发行部) (010) 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开 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字 数 540 千字

印 张 35.75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 66509618

前 言

一 编写缘起与体例

梁启超称“千年以来研究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章实斋三人而已。”^① 又称“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② 傅振伦也认为“盖我国史籍起于皇古，而历史之学则始于刘氏《史通》。”^③ 唐代刘知几撰写的《史通》，对唐以前的历代史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开创了史学理论研究的先河。对于这部体例完备、博大精深的理论著作，我们不仅要读懂文本，更要在此基础上了解其理论体系，了解其理论命题提出的背景、产生的影响以及在史学史上的意义。

那么，《史通》提出哪些的理论命题，后人围绕这些理论展开了怎样的讨论？我们今天想了解这些问题并不容易，这是因为《史通》尚没有汇校集评的整理本，现存的《史通》注本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目前，《史通》最为通行的评注本是清代浦起龙的《史通通释》。^④ 浦氏善于划分章节，申讲大义，对我们解读《史通》文本提供了很大方便，而且“注释采博析微，考文订义，实为是书功臣”。^⑤ 不过，浦起龙常常凭借自己的臆断妄改原文，其议论也只是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东方出版社1996年。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二章，东方出版社1996年。

③ 傅振伦《刘知几年谱》，中华书局1963年。

④ 浦起龙《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⑤ 周季旣在《史通通释》二十卷卷首朱笔评语，见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史部史评类。

一家之言，不少学者批评他识见浅薄，有村学究的习气，^① 民国学者刘咸炘和陈汉章等对此多所是正，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史通通释》时对此没有吸取。近代以来，著名史学家刘咸炘、吕思勉和张舜徽等对《史通》的史学理论进行了卓有成就地研究，^② 这些著作已陆续出版，但只有评论没有原文，给读者阅读带来不便。而明代郭孔延《史通评释》、清黄叔琳《史通训故补》、清纪昀《史通削繁》等著作，理论价值也很高，由于缺乏整理，读者很难看到。除此之外，前代学者关于《史通》的单篇论文和简短精赅的评论，如孙何《驳史通序》、于慎行《史通举正论》、皮锡瑞《〈史通·惑经篇〉书后》，陈庆年《读〈史通·编次篇〉》、黄家岱《读〈史通·称谓篇〉》等，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但却一鳞半爪，分散在浩瀚的书籍中。鉴于此，今天有必要对《史通》的理论成果进行一番梳理。

其次，在《史通》的注释方面，今人张振佩《史通笺注》和赵吕甫《史通新校注》^③ 可谓集前人之大成，但这两部著作发行很少，读者很难见到。

本书的编写体例如下：

1. 【题解】：概括本篇的基本理论问题；
2. 正文中间插入了浦起龙《史通通释》等对段落章节的疏解，以便于读者了解文章行文的脉络；
3. 【注释】：充分吸取了前人的优秀成果；
4. 【集评】：篇末系统搜罗诸家精到的评论，对尚未断句的评论进行断句，较长的评论前面添加简短的概括，以方便读者阅读。
5. 底本：在文字校勘方面，以赵吕甫《史通新校注》为主。

^① 清陈鱣《史通》（校宋本）手跋批评浦起龙“妄改妄删”，且“多缀评语，近于村学究习气”，见《韶宋楼藏书志》卷三十八；又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学类“史通通释”条评价浦氏“识趣既卑，文又拙涩，全是三家村学究习气”。吕思勉《评校〈史通〉序》：“评语间有可采，然十八皆陋儒评文之见也。”

^② 刘咸炘《史通驳议》，见《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年；吕思勉《史通评》，见《吕著史学与史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舜徽《史通平议》，见《张舜徽集·史学三书平议》，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 张振佩《史通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赵吕甫《史通新校注》重庆出版社1990年；程千帆《史通笺记》，中华书局1980年。

《史通》多为明刻本，浦起龙《史通通释》虽以宋本为底本，^①但其私自臆改处很多。赵著后出转精，在校勘方面详列出处，所以本书多以此为据。

二 批评角度的转变与《史通》经典价值的确立

《史通》成书以后经历了漫长的沉寂，在明代中叶以后才被看作是不朽的经典。前代学者对《史通》的评价为何存在这么大的差异？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探讨。本书通过梳理前代学者的评论资料，发现《史通》价值的确立与批评角度从经学转向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史通》本是论史之作，书中也涉及到经学，如刘知几把史学的渊源追溯到《尚书》、《春秋》；在史家实录精神的影响下，刘知几撰写《疑古》、《惑经》对尧、舜、禹的“禅让”及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等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进行了大胆质疑。其实，不论刘知几在经学方面的造诣如何，也不论他的怀疑是否正确。经学只是《史通》涉及的一个方面，但是唐宋时期的学者却几乎以经学作为评价《史通》的唯一标准。

唐宋时期的学者对刘知几的史学成就不太关注，却掀起刘知几《疑古》、《惑经》中怀疑圣贤的小辫子不放，指责他“工诃古人”。晚唐柳璨的《史通析微》可谓开其先声，其书“以刘子玄《史通》妄诬圣哲，评汤之德为伪迹，论桀之恶为厚诬，谤周公云不臣，褒武庚以徇节，其甚至于弹劾仲尼。因讨论其舛谬，共成五十篇。”^②此后，宋人孙何批评《史通》“逆经悖道，拔本塞源”，张唐英批评刘知几“徒好辩而不知《春秋》之旨”^③，他们通过指责刘知几离经叛道以捍卫道统的尊严，这种批评因而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所以并不完全公正客观。《史通》也因此大受贬抑，五代后晋所修《旧唐书·经籍志》居然不加著录，宋初王尧臣《崇文总目》却将其错误

^① 陆心源《影宋抄〈史通〉跋》：“浦起龙《通释》本虽不言所自，而与此本皆合，则当见影宋本矣。”

^② 《郡斋读书后志》卷一《史评类》。《唐会要》卷六三“光化三年，直史馆柳璨，以刘子玄所撰《史通》议驳经史过当，纪子玄之失，别纂成十卷，号《柳氏释史》，又号《史通析微》。”

^③ 孙何《驳史通序》，张唐英《读史通》录自明人卜大有辑《史学要义》。

地置于杂史类，而南宋郑樵《通志·艺文略》竟将其置入正史部分中的通史类，《史通》的学术价值变得模糊不清，自然也很少有人刊刻，连朱熹也“犹以未获见《史通》为恨”。总之，唐宋时人从经学立场出发指责刘知几“妄诬圣哲”，正是《史通》在当时备受冷落的重要原因。^①

明代郭孔延的《史通评释》问世后，《史通》的评价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该书的批评立场虽然还是以经学为主，作者对外篇中的《疑古》、《惑经》、《申左》、《汉书·五行志杂驳》、《汉书·五行志错误》等涉及经学的篇章用力颇勤。但《评释》把《史通》涉及的经学当作学术问题，卫道的色彩已经淡化，评论也由机械的攻讦转向客观的评述。《评释》主要从研究方法上来批评刘知几的经学研究，认为刘知几“薄尧舜而贷操、丕，惑《春秋》而信《汲冢》”^②，即迷信魏晋出土的汲冢典籍而怀疑儒家经典和圣贤，这是研究方法上的失误，这一点对近人吕思勉有很大启发。另外，《评释》也实事求是地赞扬了刘知几在经学上的贡献，如《申左》篇评论“子玄叙《左》之长，揭《公》《谷》之短，如分苍素矣”，“而非子玄之精练，亦无以析其义而彰其功，昔人谓杜元凯为左氏忠臣，子玄申左之功，不在杜下。”

《评释》对《史通》的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所以不再把经学当成评价《史通》的唯一标准，认为“谓子玄精于史则可，精于《春秋》则未可”，这一观念使得学者虽然意识到刘氏在经学方面的缺陷，但并不影响对其史学价值的肯定。自此以后，学者多抱着学术研究的态度来对待《史通》涉及的经学问题。清代黄叔琳和纪昀主张删掉《疑古》、《惑经》中的某些章节^③；黄本骥和皮锡瑞对刘知几的错误进行了一一订正^④；而吕思勉则认为刘知几迷信《山海经》、《汲冢纪年》而怀疑《春秋》、《尚书》，是因为当时“无考据之学，故辨旧传之说、不足信之文绝希”，吕思勉特意撰写《广疑

① 正如张鼎思《续校史通序》所说“其论史则信冢书而疑坟典，讥尧舜，訾汤文，诋周孔，不少顾忌……刻之不广，大率为此。”

② 明郭孔延《史通评释》序。

③ 纪昀《史通删繁》便删掉了《疑古》、《惑经》等章节。

④ 黄本骥《痴学》卷七《信古录》专驳《疑古》篇，皮锡瑞撰有《〈史通·惑经篇〉书后》。

古》来示范如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疑古，吕氏甚至还由刘知几的失误而深刻反省近代以来迷信出土文物而怀疑传统文献的学术思潮。^① 民国学者陈汉章对刘知几的《疑古》、《惑经》进行了今文经学的阐释，认为其中寓有针砭现实的意义：“此篇所谓古，实皆言今也。唐初君臣、父子、兄弟间多见惭德。刘氏身为臣子，不敢昌言，乃假古以切今，实惩前而毖后。……今一一以唐事证之，可见刘氏之疑非古事矣。”陈汉章的观点，推动了《史通》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郭孔延《史通评释》不仅纠正了前人单纯依据经学来否定《史通》的倾向，另一方面，对《史通》的史学价值也进行了深入的挖掘，这样《史通》的评价立场开始由经学转向史学，其《史通》的史学批评内部，又存在两种发展趋势，影响着对《史通》学术价值的评价：

首先，“史馆编撰”与“私家著述”。

刘知几撰写《史通》是为了给史馆修史确立编纂体例。虽然他曾激烈地批判史馆内的史臣养尊处优、不学无术，但他并不反对史馆修史。《忤时》篇称“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主，条章靡立……今者史司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欺，而汗青无日。”可见，刘知几认为只要条例得当，馆局纂修也能成一家之言。他在《序例》篇还说“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对于刘知几受到史馆修史风气的影响，近代学者刘咸炘有精审的评价：“知几之牵于史馆固可悲矣，然其见固不能超越于馆局之风也。盖自班书以后，断代体行，而每代之末，必修前代之史，开局设监之制由是兴，整齐记注之法由是定，与古者通观古今待其人而抒其独断别识者异。……《自叙》篇亦自言有删定群史之志，是固欲脱馆局而为专家也。然整齐之风，至唐之馆局而成，知几适生其时，所见固不出于此，通古别识、圆神变化之术，彼固无所明也。生于是，学于是，故虽欲去是而自不能外是。《序例》篇曰‘史之有例，犹国有法。’此一言也，足以

^① 吕思勉《史通评》。

括其所持。夫例者，固馆局整齐记注之所需，而专家别识之所不用也。二十卷中不外言例，其得其失，皆在于是。”

刘知几志在为史馆修史确立条例，自然和主张私家著述的章学诚观点不同。刘、章被称作史学理论的“双璧”，其学术旨趣最大的区别，可以说是馆局纂修与一家著述的区别，正如章氏所言“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①章氏认为史馆修史而书成于众手，“史文等于科举之程式，胥吏之文移，而不可稍有变通”，所以倡言自创体例，成一家之言，“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②从私家著述的角度来看，刘知几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明于纪传而闇于表志，囿于断代而昧于通史”，^③也就是刘知几只推崇断代的纪传体，而不重视通史和表志，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的《释通》和《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等篇中进行了修正。

从注重私家著述的立场出发，钱穆对《史通》也多有批评。首先，钱穆认为刘知几不如私家著述的刘勰学问淹博，“刘知几在唐朝史馆里蹲了卅年，一生学问并未超出了历史，只恨自己没有来写一部史，不像刘勰，从开头在和尚寺，将来还是做和尚，然而他倒能注意到学问大全和文学本原，经史会通，这许多方面去。所以说，唐初的《史通》，可说是《隋书·经籍志》全部史学的最后结束。我们从《史通》的缺点，就反映出东汉以下当时中国史学上的缺点。而当时的大学问反而跑进和尚寺，不仅佛学在和尚寺里，即如刘勰的《文心雕龙》也见其超出于像刘知几《史通》之上了。”^④其次，钱穆认为刘知几的史学理论只是评价此前史书之优劣，而对历史发展的大势没有涉及，缺乏周公、孔子到司马迁的史学精神。“《史通》向来列为一部评史的书，但评史更重要是在评论这一时代的历史。而《史通》只是评论‘史书’，不是评论历史。”^⑤“我们读了刘知几《史通》，就可回过回头看东汉以下直到唐代初年的这一段史学。在外观上看，是史学很盛，但是看到他的内里精神方面去，史学实已

① 章学诚《家书二》，见《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章学诚《家书三》，见《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③ 刘咸炘《史通驳议》。

④ 钱穆《中国历史名著》之“《杜佑〈通典〉上》”，三联书店2000年。

⑤ 钱穆《中国历史名著》之“《刘知几〈史通〉》”。

衰了，远不能同从周公孔子到司马迁那一段相比。我们也可说，刘知几《史通》其实也只是等于一部材料的书。在他以前许多史书，哪部书特点在哪里，哪部书长处在哪里，我们借有《史通》可得很多知识。”^①其实，钱穆在此强调的史学精神，和章学诚倡导的私家著述要继承《春秋》家法，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从刘知几倡导史例，到章学诚倡导“史意”和钱穆倡导“史学精神”，这也显示出史学理论的发展和进步。

其次，既然《史通》旨在为官修史书确定编纂条例，那么这些条例有哪些？这些条例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其思想渊源是什么？对后代史学产生什么影响？这便牵扯到《史通》史例的分析。

学者对《史通》史例的分析，有一个从“义例”转向“体例”的过程。上文已经提到，郭孔延《评释》依据经学立场批评《史通》，在批判刘知几经学缺陷的同时，也肯定其史学成就。那么，《评释》所重视的刘知几的史学成就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其序称《史通》“考究精核，义例严整，文字简古，议论慷慨”，但他所讲的“义例”不是史书编撰的体例，而是判断刘知几的“议论慷慨”是否符合经学立场。可见，郭氏在评价刘知几史学成就时，依然受到其经学立场的制约。这样，《评释》主要在探讨刘知几所评价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是否得当，如项羽是否该入《本纪》，陈涉是否应当入《世家》，三国的正朔在魏还是在蜀等，这都可以看出他受到经学观念的影响。

后世学者对上述话题虽然也还在讨论，不过批讨论的重心已由义理的阐发而转向体例的分析。如浦起龙《史通通释》分析唐后史书对《史通》确定的体例的继承，他说“第取唐后成书印证之，断可见矣。自其以编年、纪传辨途辙也，而二体之式定。自其以《史记》、《汉书》昭去取也，而断代之例行。自其斥《秦纪》于未帝之先也，而开创无冒越之篇。自其拟世家以随时所适也，而载记有变通之义。自其论后妃称纪或寄外戚皆非也，而传首始正。自其论篇赞复衍，更增铭体尤赘也，而骈韵都捐。自其力排班志之《五行》也，而灾祥屏讖纬之芜。自其痛诋魏收之标题也，而称谓绝诞妄之

^① 钱穆《中国历史名著》之“《刘知几〈史通〉》”。

目。自其以书地因习为失实也，而邑里一遵时制。自其以叙事烦饰为深诚也，而琐噓半落刊章。……为之向导者，《史通》也。综往伤归，功亦博矣。”民国时期的几部造诣深厚的评论著作，如刘咸炘《史通驳议》、吕思勉《史通评》以及张舜徽《史通平议》等，对《史通》关于史书编纂所确立的体例之来源、影响，以及是否得当，都进行了客观的分析。

三 史通读法

如何读《史通》，程千帆结合《史通》的理论体系，提出了下列简便可行的意见：

首先，可以读《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两篇。我国史籍起源上古，历代都设有史官，记录史事，《尚书》及甲骨文都可以证明。《史官建置》一篇，叙述了唐以前历代编年、纪传两体正史得修撰情况。将两篇合观，就是一部雏形的史学史。先读这两篇，便掌握了古代史学发生和发展的大致情况。其次，可读《六家》、《二体》、《杂述》三篇。它们都是说明史籍体例的。刘知几按照古代史籍的结构、断限等特点，将它们分成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等六家。同时又按照其体例分为编年、纪传二体，总称为正史；而将正史以外的各类史籍，共十种，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都归入杂史。这三篇告诉了我们古代史籍体例及目录分类情况，为我们进一步阅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关于史部书籍的评价，提供了方便。再次，可续阅读《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这八篇都是讨论纪传体史籍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刘知几虽然认为纪传、编年都是正史，但一因纪传体比编年体更能从不同的角度显示历史的全貌，二因纪传体自《史记》以下，历代都有成书，未尝中断，所以后来正史之名便为纪传体所专有了。人们常常称道的十七史、二十二史、二十四史，便都是指纪传体的正史。《史通》这八篇，告诉了我们唐以前纪传体史籍各个部分的情状，并探讨了它们的义例得失，使读者对纪传体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再次，《断限》、《编次》、《直书》、《曲笔》、《题目》、《称谓》、《载言》、《载

文》、《书事》、《烦省》、《采撰》等篇则是通论史籍的编撰原则及方法的。再次，则有讨论史籍文字技巧的各篇，如《叙事》、《浮词》、《模拟》、《言语》、《点烦》等。

以上二十余篇，可以算是《史通》全书最主要的部分。把它们通读以后，再看其它各篇，也就容易了。在阅读《史通》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浦起龙《史通举要》可谓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今抄录全文如下：

《史通》开章提出四个字立柱棒，曰“六家”，曰“二体”，此四字刘氏创发之，千古史局不能越。自来史家认此四字者绝少，此四字管全书。

六家中，二体更是主脑。《史通》首奉左、班。左、班，二体初祖也。非史者不祖，故退公羊、谷梁。史非断代成书者不祖，故乙司马。

《史通》所痛斥者，后魏、后周两家：是刘、萧代兴，拓跋所忌，魏收北产，目为“岛夷”，造立诡名，义殊“索虏”，其史诞，诞者不信；黑獭弑主，罪浮贺六，苏绰巧盖，文以《周官》，方之《美新》，得无类似，其史惭，惭者不直。不信不直，史家贼也。

刘氏开发史例，后史不能易者十得六七。愚于《自叙篇》略经点出。

只缘史论有“工诃古人”一语，便认《史通》作扞扯苛碎之书；又缘山谷以《文心雕龙》并称，便认为《史通》是繡绘浮华之册。枉屈不少。

评者集矢刘氏有故，为《疑古》诸篇也，此是公家见解；评者集矢刘氏有故，为推奖王劭也，此乃随人走趋。刘氏起疑，由莽、操、师、昭，不由舜、禹、伊、周；王劭由触讳得恶传，刘独直之，人皆怪之。怪之由，由恶传直之由，由触讳。

《史通》支离，在《载言》、《书志》等篇。《史通》破绽，在《品藻》、《人物》等篇。出言易，则制法不行；见理粗，则论人杂出。若《疑古》、《惑经》，是学究之所臧，明者所不与校也。

刘氏不喜繁称，不喜小说，惜史体，故执此太坚，往往言过其直。然到《烦省》、《杂述》、《内篇》尽处，却一齐拉转，既防褒史，仍防废书，非偏任者。

刘氏于诸作者轻口挥斥，曰“愚”曰“妄”，甚至曰“邪说”，

曰“小人”，真乃罪过。是渠无素养之证见，亦是渠积素愤之由来。

凡著书必不能无谬误。他人之误，由记分生；刘氏之误，由记分熟。生者不到边，熟者不复勘。

《史通》通一部，成一篇，但拈一篇者，于《史通》无预。《通释》释一篇，照一部，未了一部者，于《通释》亦无预。

《通释》之成，在北平本未行之前，中间征事，颇多暗合。若在见后增加，必不掩其所自。容有涓埃所及，小益高深，乐与天下共见之。

《史通》原序

刘知几 撰

长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国史，寻迁左史，于门下撰起居注。会转中书舍人，暂停史任，俄兼领其职。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兼修史皆如故。又属大驾还京，以留后在东都。无几，驿征入京，专知史事，仍迁秘书少监。◎浦云：首叙历官，即《自叙》篇所谓“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也。其注云：“今之史馆，即古之东观。”

自惟历事二主，从宦两京，遍居司籍之曹，久处载言之职。昔马融三入东观，汉代称荣；张华再典史官，晋朝称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职思其忧，不遑启处。◎浦云：此总上历官，拈合当职撰史事，即以引起《史通》之作。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篋。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浦云：此六句暗笼《史通》。

昔汉世诸儒，集论经传，定之于白虎阁，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且汉求司马迁后，封为“史通子”，是知史之称通，其来自久。博采众议，爰定兹名。◎浦云：此层明点《史通》，两引古史古事，以见命名所本。凡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旧注：除所阙篇，凡八万三千三百五十二字，注五千四百九十八字。◎浦云：字数今不可定，姑仍旧本存之。

于时岁次庚戌，景龙四年仲春之月也。浦云：观此一序，简明典切，即可征其史笔之洁。

目 录

前言	1
《史通》原序	1

内 篇

卷一	3
六家 第一	3
卷二	35
二体 第二	35
载言 第三	42
本纪 第四	47
世家 第五	53
列传 第六	59
卷三	65
表历 第七	65
书志 第八	71
卷四	95
论赞 第九	95
序例 第十	101
题目 第十一	107
断限 第十二	112

编次 第十三	119
称谓 第十四	126
卷五	133
采撰 第十五	133
载文 第十六	139
补注 第十七	146
因习 第十八	151
邑里 第十九	157
卷六	163
言语 第二十	163
浮词 第二十一	171
叙事 第二十二	176
卷七	193
品藻 第二十三	193
直书 第二十四	199
曲笔 第二十五	203
鉴识 第二十六	211
探賾 第二十七	216
卷八	223
模拟 第二十八	223
书事 第二十九	229
人物 第三十	235
卷九	243
核才 第三十一	243
序传 第三十二	248
烦省 第三十三	253

卷十	259
杂述 第三十四	259
辨职 第三十五	266
自叙 第三十六	270

外 篇

卷十一	281
史官建置 第一	281
卷十二	293
古今正史 第二	293
卷十三	315
疑古 第三	315
卷十四	331
惑经 第四	331
申左 第五	345
卷十五	351
点烦 第六	351
卷十六	363
杂说上 第七	363
卷十七	383
杂说中 第八	383
卷十八	395
杂说下 第九	395